

# 梁啟超與中國書法

中石齋



金玉甫 著  
河南美術出版社

梁啟超與中國書法

中石齋



金玉甫 著  
河南美術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梁启超与中国书法/金玉甫著. —郑州: 河南美术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401-2063-4

I. 梁… II. 金… III. 梁启超 (1873~1929) —汉字—书法—艺术理论 IV. J2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79314号

---

|      |                        |
|------|------------------------|
| 书 名  | 梁启超与中国书法               |
| 编 著  | 金玉甫                    |
| 责任编辑 | 白立献 梁德水                |
| 责任校对 | 敖敬华 李 娟                |
| 出版发行 | 河南美术出版社                |
| 地 址  | 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编: 450002   |
| 电 话  | (0371) 65727637        |
| 印 刷  | 郑州新海岸电脑彩色制印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
| 印 张  | 13.5                   |
| 字 数  | 213千字                  |
| 印 数  | 0001—2000册             |
| 版 次  | 2010年9月第1版             |
| 印 次  |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401-2063-4 |
| 定 价  | 38.00元                 |

---

## 序 言

金玉甫的《梁启超与中国书法》即将出版，我非常高兴。这是根据他的博士论文补充整理而成的。玉甫对近现代史上的梁启超的著述和书迹作一番深入细致的考察梳理，把梁启超在书法方面的成就给予系统展示和较深入论述。在中国书法史的研究中，似乎还未见人这样做过。在对梁启超的研究中，也未见过有人对其书法作这样全面的考察。这为中国书法史、中国近代文化史、艺术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这项研究也是梁启超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卓越的政治家和学识广博的学者，他在哲学、史学、文学等方面都有深入研究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书法似乎是梁先生不太经意的一个方面，他未当“事业”来做，但他高人大智，单就其“书法”成就来看，也高过许多时人。这些金玉甫在研究中给予充分重视，作了较细致的论述。

梁启超先生首先是一位政治家。康、梁所领导的维新变法虽然失败，但在近代积贫积弱的中国所引发的震荡，在沉闷的华夏国土上唤起了国人奋发图强的意识，显示了“先进的中国人”的先知先觉和大智大勇。他那救国救民的政治热忱和勇猛精进的人格力量令人敬佩。单就这一方面说，梁启超就不愧为民族的精英，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熠熠闪光。退出政治风潮以后，梁任公又潜心学术，他既具有在经史子集诸方面扎实的国学功底，又具有宏阔高远的理论视野。“睁开眼睛看世界”，会通古今论学术。在史学、文学、哲学等方面都是高屋建瓴，著作等身，开一代学风，沾溉后人。梁任公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学者，其学术成就是他为中华民族作出的第二方面的贡献。梁启超还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是清华大学研究院的著名国学导师，一些学养深厚的学者曾就学其门下。而在书法方面，他那宽博厚重、碑帖兼容的字迹，他在通览中国文化史中对书法所作的要言不烦的论说以及在碑帖题跋中所阐发的见解，都给人许多启发。所以梁启超也是一位风格鲜明的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绝非那些斤斤于点画，仅以书法张扬招摇的“书家”所能比。

梁启超是政治家、学者、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书法家。古代的书法家大

都是后人“追认”的，许多文人、学者并不以“书”为意，虽善书，但不喜欢以“书”招摇。视书为技，以书为用，这不算偏见，这是大多数中国古代文人的通识。梁任公具有很高的书法水平和书学成就，但在梁氏一生的成就中，这只是一个方面，并且是一个小的方面。记得前些年一个大学书法专业的博士入学考试，有一个题目是概述梁启超的学术成就，有的考生只是知其书法，不知其学术，显然属不了解任公其人。知其人，知其行，知其学，方能知其书，研究梁启超之书法必当如是。

书法研究不应仅是“点画之学”，不应仅仅视为“艺术研究”，要有宏观的视野。对书家的研究要首先看到他是社会的人、文化的人、多侧面的人。他的书写活动不应尽视为“书法创作”，他留下的字迹不应仅视为“艺术作品”，不应仅从点画或书风书貌来看其“书法”，看其“怎么写”，还要看他“为什么写”，“写什么”。如果说“学习”书法仅模仿其点画、结构便可以了，而如果是“研究”书法，则要全面地看书家其人、其行、其文、其学、其书。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提出他的“知人论世”说。孟子这里的“书”不是指“书法”，但我们可以借孟老夫子的话说：研究其书法，不知其人可以吗？不知他所处的时代可以吗？只有把“人”和他所处之“世”联系起来去考察，方可知其“人”；只有知其“人”与所处之“世”的具体关系，方可知其人之行、之学、之艺。

在和博士们讨论博士论文的写作时，我曾强调，写历史人物、事件、现象，需要写出其产生和存在的文化背景，但不必写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化背景”。一个书家的生活交往总是具体的，总是在一个既定的地域与生活环境中接受教育，成长、活动、为官、为学、为艺。一些书家虽然大致生活在同一时代，但苏轼与黄庭坚是不一样的，文徵明与祝允明是不一样的，康有为与梁启超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书家都是具体的“这一个”，他们的生活经历、环境都是具体的、独特的，必须对书家生活的具体环境和背景进行考察，方能知其人、其学、其艺。我也曾强调，不必把书家的“书风书貌”与书家的世界观、人生观硬性“对接”，好像一个人写什么样的字都是由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决定，进而又是那个时代的哲学和“时代精神”决定。具体来说，在古代书家的字迹中，“写什么”是由实际的、具体的需要决定的，“怎么写”是由跟谁学写字、学什么帖逐渐形成的个人书写习惯决定的。把写什么样的字、什么点画、什么结体、章法硬与世界观、人生观、政治思想、学术思想以及社会政治变革、哲学思潮联系起来，好像“挖掘”很深入，其实不得其要。写字是技术

性、操作性的问题，是“形而下”，哲学思想、学术观点是“形而上”的问题，写字的风格与一个人的人生观、哲学思想、政治观点等没有多大关系。书法研究要实事求是，金玉甫对梁启超书法的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力求在梁启超所处的时代中认识梁启超，在梁启超整个人生的多方面成就中认识梁氏有关书法的“那些事”，不有意拔高，也不有意贬低，客观地梳理、论述和肯定了梁任公的书法方面的成就，提出了个人的一些见解，为中国近代书法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资参考的学术成果。

刘守安

2010年4月于首都师范大学

## 目 录

|                         |    |
|-------------------------|----|
| 绪 论 .....               | 1  |
| 第一章 梁启超生平及著述 .....      | 11 |
| 第一节 梁启超其人、其学与其“书” ..... | 11 |
| 一、传统文化培育的士子 .....       | 11 |
| 二、变革时代的政治家 .....        | 13 |
| 三、学识广博的学者 .....         | 17 |
| 四、碑帖兼善的文人书家 .....       | 20 |
| 第二节 梁启超的著述情况 .....      | 22 |
| 一、史学著述 .....            | 23 |
| 二、文学著述 .....            | 32 |
| 三、书学著述 .....            | 33 |
| 第二章 梁启超对书法功能的认识 .....   | 41 |
| 第一节 以“书”为用 .....        | 41 |
| 第二节 以“书”为学 .....        | 47 |
| 第三节 以“书”为艺 .....        | 50 |
| 第四节 以“书”为乐 .....        | 58 |
| 第三章 梁启超对中国书法的研究 .....   | 65 |
| 第一节 梁启超对各时期书法的评价 .....  | 66 |
| 一、先秦书法 .....            | 67 |
| 二、两汉书法 .....            | 70 |
| 三、魏晋南北朝书法 .....         | 73 |
| 四、隋唐书法 .....            | 84 |

|                             |     |
|-----------------------------|-----|
| 五、唐以后书法·····                | 89  |
| 第二节 梁启超书法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 92  |
| 一、书体的嬗变·····                | 92  |
| 二、“南北之争”的对话·····            | 96  |
| 三、对“传统”的认识·····             | 101 |
| 四、评“书”语言的选择·····            | 102 |
| <br>第四章 梁启超对学“书”方法的认识 ····· | 113 |
| 第一节 模仿与创造·····              | 113 |
| 第二节 碑帖选择·····               | 122 |
| 第三节 用笔·····                 | 131 |
| <br>第五章 梁启超的书法活动 ·····      | 137 |
| 第一节 梁启超的金石搜求及题跋·····        | 137 |
| 一、叙碑刻的出土、发现的原委、藏所及去向·····   | 142 |
| 二、记拓本的递藏情况·····             | 143 |
| 三、校记·····                   | 143 |
| 四、考释碑刻文字·····               | 144 |
| 五、题署碑刻名称、年代·····            | 145 |
| 六、校订、存疑·····                | 146 |
| 七、记事、叙见闻·····               | 147 |
| 八、品评书法·····                 | 148 |
| 第二节 梁启超的书写活动·····           | 149 |
| 第三节 梁启超的书法风格·····           | 161 |

|                                                    |     |
|----------------------------------------------------|-----|
| 一、楷书与行书·····                                       | 162 |
| 二、篆书与隶书·····                                       | 169 |
| <b>第六章 梁启超书法对后世的影响</b> ·····                       | 175 |
| 第一节 梁启超书学思想的历史价值·····                              | 175 |
| 一、拓展了传统书学研究的视角与方法·····                             | 175 |
| 二、引领“正学” ·····                                     | 177 |
| 第二节 梁启超书法实践的时代意义·····                              | 178 |
| 一、创立“新碑体” ·····                                    | 178 |
| 二、树立“学者书法”的典范·····                                 | 179 |
| 第三节 梁启超书学思想的时代局限·····                              | 181 |
| 一、梁启超思想本身的局限·····                                  | 181 |
| 二、论证内涵的不足·····                                     | 182 |
| <b>结 语</b> ·····                                   | 184 |
| <b>参考文献</b> ·····                                  | 187 |
| <b>附录：梁启超书法活动年表（民国前月份<br/>    用旧历，之后用新历）</b> ····· | 191 |
| <b>后 记</b> ·····                                   | 203 |

## 绪 论

梁启超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时期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下培育的士子，学识广博的学者，晚清变革时代的革新者、政治家，其政治主张、学术思想，对当时及后来的政治革新、文化生活、学术进步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书法”对于著述浩瀚的梁启超来说只不过是一种“余事”。与中国历代文人士大夫一样，梁启超觉得“书法”是他须臾不可离身的工具，是虽然不值一提却又让他倾注过不少精力的个人爱好。他以“书”为工具，为社会服务，为时代尽力，实现个人人生价值，这在梁启超科第前对于“大卷子书”<sup>[1]</sup>的认识可见一斑。梁启超生活在封建社会末期，作为士子、学者、维新派的核心人物，他的日常活动都离不开“书”。梁氏时刻关注着“书”，但由于他的政治声望和学术成就，并非要以“书”名世。他在紧张、凶险的政治生涯和有限的学术生涯中为人作书、题字，将“书”当作工具革新、办刊、治学、为文，均“以书为用”；他留意有关“书法”的文献，并对其进行鉴赏、鉴别、论说、研究，对各类书法现象关注、说解、研究，“以书为学”；他还将“书”当作“艺术”展玩、书写，并较早地尝试将西方美学纳入到中国传统书学中进行研究，“以书为艺”；他在退隐政坛之后，治学之余，更将书法当成了一种“娱乐”活动，认为书法是一种非常健康而高雅的娱乐方式，“以书为乐”。梁启超一生临池不辍，即使在政治避难、流亡异国他乡的岁月里也不忘带上心仪的字帖，坚持每日临写，于“传统”“吃”得很深。我们细细浏览梁氏遗留下来的大量书迹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他精湛的“书法”与当时及后来暗淡的“书”名是极不相衬的。沈从文在谈及“近代笔墨”时开篇道：“康南海先生喜谈书法，谈及近百年笔墨优

[1] 1927梁启超年在《书法指导》一文中说：“我年轻的时候，想得翰林，也学过些时候的翰林字，到现在，总不脱大卷子的气味。”见《梁启超全集》第十七卷《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北京出版社，第4949页，1999年。

劣时，有所抑扬，常举例不示例，不足以证是非。至于南海先生个人用笔结体，虽努力在点画间求苍茫雄奇效果，无如笔不从心，手不逮意，终不免给人一芜杂印象。……反不如梁任公、胡展堂同样是广东人，却能谨守一家法度，不失古人步骤，转而耐看。”<sup>[1]</sup>我们可以想象，梁启超若不是将过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社会活动中，或者他在世的时间再长一些（57岁去世），清末民初的书法史中将又出现一位大家。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县人，近代中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与业师康有为（1858—1927年）共同携手发起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运动，从此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在长达30年的政治生涯中，作为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积极投身于复杂凶险的政治斗争，宣传维新变法。他创办报刊，以饱含感情的文字唤醒青年，使他们走上救国之路。他因此成为中国近代杰出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宣传鼓动家，为我国近代报刊事业的奠基人。其政治远见、文化思想影响到了胡适、鲁迅、郭沫若、毛泽东等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最为重要的一批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郭沫若在其回忆录《少年时代》中充满感情地说：“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活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载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些兴气锐利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他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兄弟——无论赞成还是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代言人。”<sup>[2]</sup>甚至说：“他（指梁启超）著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他译的《经国美谈》，以轻灵的笔调描写那些亡国的志士、建国的英雄，真是令人心醉。我在崇拜拿破仑、俾士麦之余，便是崇拜加富尔、加里波的、玛志尼了。”<sup>[3]</sup>毛泽东青年时代就十分钦佩梁启超，对他主编的《新民晚报》爱不释手，对他的文章读了又读。在青年毛泽东眼里，梁启超的政治追求、理想构架、道德文章都是一流的。他习惯称“梁康”，而不是“康梁”。

梁启超一生只度过了56个春秋，却给后人留下了1400多万字的宏富著述（不包括书信），涉及政治学、史学、文学、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

[1] 沈从文：《谈写字》，《沈从文全集》第3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第129页，2002年。

[2] 《梁启超全集·前言》，北京出版社，第1页，1999年。

[3] 《梁启超全集·前言》，北京出版社，第1页，1999年。

教育学、新闻学、图书文献学、佛学、伦理学、美学、金石学、考古学、美术学等各个领域。特别是1920年梁氏48岁以后，他逐渐脱离政界，行迹遍及欧美，潜心学术，先后撰写了《清代学术概论》（1920年）、《中国历史研究法》（1921年）、《先秦政治思想史》（1922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3年）、《中国文化史》（1926年）等重要学术著作，总著述《饮冰室合集》（林志钧编）就达上千万字。由于日常工作、生活中对汉字的勤写勤练，梁启超的书法也随之独步一时。

梁启超作为世纪之交的一位思想家、文化巨子，他同样对书法有着自身独特的见解。这些观点或以讲稿的形式娓娓道来，或散见于他为各种书迹所作的题跋和来往书信中，或隐含在他的学术论著里。诸如《中国地理大势论》（1902年）、论书诗《若海自称其书已脱古公役属要我承为独立国作诗嘲之》（1907年）、论书诗《自题所藏唐人写〈维摩诘经卷〉为敦煌石室物罗瘘公见赠者》（1909年）、奉题南海先生所藏翁覃溪手写《冯天岩墓志铭》（1909年）、《双涛阁日记》（1910年）、《稷山论书诗序》（1923年）、《题〈海粟近作〉》（1926年）、《书法指导》（1926年）、《王国维墓前悼词》（1927年）等著述中都有他对书法的认识。这些看似平淡的言论往往能见出他对书法深刻的见解。

更为可贵的是，梁启超一生收藏了大量的金石拓本。粗略算来，这些金石拓本跨度从商代到民国共有近1300件，而且多数为嘉庆、道光时期以及清中期以至民初时新出土碑志造像的初拓本，也不乏明代和乾隆时期的上乘拓本，后由梁氏家人无私捐献给国家，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这些珍贵的拓本上，有梁启超题跋的就达120余件，这些题跋不仅可以直观展现梁氏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书写风格，也能让我们从中体会到他对于不同时期文字发展的深刻认识。尤其在品评书法方面，梁氏往往能以高远的眼光来审视书迹。梁氏没有康有为《广艺舟双楫》那样具有系统性的书学论著，因此我们的研究需要从现存梁氏的大量著述中搜集、筛选、梳理。

另外，中国古代书法史大多是对有书名者重视，而对不知名者往往轻描淡写，现可见到的清末民初这段书法史也是如此。梁启超，这位政治家、学者在书法上也尚未得到后人足够的重视。遍检诸多版本的书法史著作，往往只是将“梁”置于“康”之后略加论述，或者一笔带过，有的干脆连梁的名字也不提及。但笔者认为，梁启超的书法观点及其书法实践，是梁氏诸方面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值得我们重视和认真研究。

## 二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人物，学术界对他的关注由来已久。从梁启超逝世到今天，学界对他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涉及到了政治学、史学、社会学、哲学、文学等学科，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术界对于梁启超的著作《清代学术概论·儒家哲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研究尤多，而对梁启超的书法却关注不够，相关研究成果不多。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有关梁启超书法研究的成果如下：

1995年荣宝斋出版社出版的由冀亚平、贾双喜编著的《梁启超题跋墨迹书法集》是一部对梁启超碑帖题跋的汇编。书中较为详尽地收录了梁启超多年来收藏的碑帖拓本图片及题跋，图文并茂，书后有每个拓本的释文和相关的研究资料及时间，还附有梁氏家人捐献给国家图书馆的一千多件拓本著录以及梁启超生辰年谱。由于该书是对梁氏碑帖题跋的汇集，所以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由丁文江、赵丰田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梁启超年谱长编》是一部较为详细介绍梁启超生平的专著。全书共有七十余万字，其主要部分是谱主与其师友的来往书信，共七百余件，约占全书的百分之八十。这些大量的书信，很多是往来于梁启超与关系密切的师友之间，其中言论更能真实地反映作者的思想观点和政治倾向，包括丰富的治学思想。该书从梁启超1929年1月逝世就开始启动资料搜集的工作，到1936年著成《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再到1983年《梁启超年谱长编》的出版，历时半个多世纪。书中不少的材料都是从海内外梁启超师友处征集而来，以及梁氏诗、词、文、电等的抄件或复印件。这些珍贵的资料都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一定帮助。

2003年珠海出版社出版的《梁启超的书法艺术》是一部全面介绍梁启超书法的专著。作者陈富树是一位梁氏故里的中青年书家，十多年来一直潜心于对梁氏书法、书论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他先后发表了《梁启超的书法》、《梁启超书学理论浅探》、《略论梁启超行草书艺术的发展过程》等多篇与梁氏书法有关的系列文章，对梁氏书法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发展、梁氏书学思想等均有一定的认识与见解。另外，因为作者有着便利的研究条件，该书图版较为详实，很多是难以见到的照片，这在以往的资料中并不多见。该书一些观点提得颇有价值，只是篇幅所限，尚待进一步展开论述。

南京师范大学高静的硕士论文《梁启超的书学观》从多个方面论述了梁启超书法的史学观、美学观、技法与创作观以及梁启超书学思想,是目前能够看到的唯一一篇涉及梁启超书学研究的学位论文。

黄映恺的博士论文《20世纪书法美学的建构与反思》从一个宏观的角度诠释了20世纪以来影响中国学术界的几位美学泰斗的思想轨迹及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对梁启超有关书法美学的思考。

杨略堂的《梁启超书品及书论刍议》这篇文章在梁启超“美术人”思想的启发之下提出“书法人”的范畴,并且阐发了当代“书法人”培育对传承中华文明传统、开发想象力及平衡心灵的意义。

此外,我们所能见的还有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梁启超致江庸书札》一书,该书收录了梁启超各个时期写给江庸的书信原件。

有关梁启超书法研究的论文还有石建邦的《梁启超书法研究三题》、李宜春的《书法艺术家梁启超》、万平的《康有为与梁启超的学术研究》、何平立《略论晚清碑学人文精神与社会变革思潮》等,这些文章或对梁氏书法的某个方面进行了解读,或将梁氏书法与晚清社会变革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分析,都为本书的进行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还应该重点提到的是由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梁启超全集》,该书是以林志钧先生20世纪30年代编辑的《饮冰室合集》为底本,以体裁、内容划分类别,分时论、学术文章、诗论诗话、诗词创作、戏曲小说、碑帖、年谱、游记、书信等部分,以文章(著作)为主,按年代为序,重新编撰而成,是一部内容完备而又便于检索的梁启超著作全集。本书研究所涉及到的梁启超重要学术论著和有关书法的大部分资料均由该书提供。

### 三

#### (一) 梁启超生平及著述

梁启超生活于剧烈变动的中国近代社会,他前期主要以政治家身份活跃在中国变法、改革的浪潮中,后期以学者的身份从事著述。梁启超的“书法活动”主要在退居政治生涯以后,即以1920年梁氏48岁为分水岭。此前他追随业师康有为致力于戊戌变法,奔走于京沪主办报业,为政治家的梁启超;此后逐渐脱离政界,行迹遍及欧美,潜心学术,为学者的梁启超。自1925年起梁氏于京津两地学府执教,著有《清代学术概论》(1920年)、《中国历史研究

法》（1921年）、《先秦政治思想史》（1922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3年）、《中国文化史》（1926年）等重要学术论著，以及与书法相关的《中国地理大势论》（1902年）、论书诗《若海自称其书已脱古公役属要我承为独立国作诗嘲之》（1909年）、论书诗《自题所藏唐人写〈维摩诘经卷〉为敦煌石室物罗瘦公见赠者》（1910年）、《双涛阁日记》（1910年）、《稷山论书诗序》（1923年）、《书法指导》（1926年）等重要著作和文章。

## （二）梁启超对书法功能的认识

在中国古代，以“书”称世的大家莫不是为科举考试而从小就发奋读书习字练就的基本功。梁启超也不例外，他说：“我年轻时候，想得翰林，也学过些时候的翰林字，到现在，总不脱大卷子的气味。”<sup>[1]</sup>又说：“吾少年喜临家庙及臧怀恪。”<sup>[2]</sup>也就是说，梁启超完全是站在一个传统文人的角度来认识和把握书法的。他生活在封建社会末期，特殊的社会背景造就了他不平凡的一生。梁启超作为传统文化培育下的士子、学识广博的学者、维新派的核心人物，尽管他并非以“书”名世，不是“书”名显赫的文人，但他的日常活动都将与“书”为伴，炽热的爱好又使得他时刻关注着“书”；他在紧张而凶险的政治生涯中，在有限的学术生涯中，挥毫著述、题跋，并潜心书学研究；他将“书”作为娱乐，体现了“艺”在古代文人那里从技艺到审美，再到精神绝对自由的理想过程。

## （三）梁启超对中国书法的研究

本文讨论梁启超对中国书法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梁对于历代书法有一个整体的认识与评价；二是他在书法史研究中对若干问题的思考。梁启超对于书法史的认识主要反映在他对古代碑刻的品评上。他往往站在字体与书风相结合、欣赏与分析相结合的立场上对书法发展的脉络作一番评述。梁启超毕生酷爱搜求碑帖拓片，还往往以史学家的眼光和立场审度书体并作题跋。他对于秦汉时期碑刻多有评论，如1917年在《秦琅邪台刻石》拓本的跋语中说：“秦皇刻石六，唐宋以还所传者，峰山泰山琅邪而已。”《裴岑纪功碑》跋语中记：“东京中叶书势，为篆隶蜕嬗之期，延光残碑，祀三公山碑，及嵩山三石阙，历历可按，景君碑立汉安二年，始见波磔，然字体犹作长方，用笔犹取

[1] 梁启超：《书法指导》，《梁启超全集》第十七卷《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北京出版社，第4949页，1999年。

[2] 梁启超：《碑帖跋·唐颜鲁公书李玄靖碑》，《梁启超全集》第十八卷《诗话、诗词集》，第5241页，1999年。

圆劲，建和以后诸刻，则姿态胜矣。”《汉景君碑》拓本中跋：“隶书作始于东京，而极盛于桓灵，建宁熹平以降，万态备矣。”此外，梁启超对魏晋碑刻和隋唐碑刻也作过详细的论述、品评。

梁启超在书法史研究中所关注的问题集中反映在他对南北书风差异之评论上。南北书风差异的理论可追溯到明末清初，冯班《钝吟书要》中说：“画有南北，书亦有南北。”<sup>[1]</sup>钱泳《书学》中也指出：“画家有南北宗，人皆知之；书家亦有南北宗，人不知也。”<sup>[2]</sup>清代阮元对此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他的两部宏篇《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以大量资料为论据提出了南北地域性风格论，旁征博引，富有创建。然梁启超业师康有为对此提出异议，他在《广艺舟双楫》中说：“阮文达《南北书派》，专以帖法属南，以南派有婉丽高浑之笔，寡雄奇方朴之遗，其意以王虞渡江而南，卢谿越河而北，自兹之后，画若鸿沟。故考论欧、虞，辨原南北，其论至详。以余考之，北碑中若《郑文公》之神韵，《灵庙碑阴》、《晖福寺》之高简，《石门铭》之疏逸，《刁遵》、《高湛》、《法生》、《刘懿》、《敬显俊》、《龙藏寺》之虚和婉丽，何尝与南北有异？……故书可分派，南北不能分派，阮文达之为是论，盖见南碑犹少，未能竟其源流，故妄以碑帖为界，强分南北也。”<sup>[3]</sup>就这个问题梁启超在其《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有一段更中肯的论述：“书派之分，南北尤显：北以碑著，南以帖名；南帖为圆笔之宗，北碑为方笔之祖。遒健雄浑，峻峭方整，北派之所长也，《龙门二十品》、《龔龙颜碑》、《吊比干文》等为其代表；秀逸摇曳，含蓄潇洒，南派之所长也，《兰亭》、《洛神》、《淳化阁帖》等为其代表。盖虽雕虫小技，而与其社会之人物风气，皆一一相肖，有如此者，不亦奇哉！……大抵自唐以前，南北之界最甚；唐后则渐微。盖‘文学地理’常随‘政治地理’为转移。自纵流之运河既通，两流域之形势，日相接近，天下益日趋统一。”<sup>[4]</sup>可见，梁启超对于“南北书派论”的态度是站在一个宏观的立场、以大视野的角度看待南北书派风格差异，其观点是非常包容的。

[1] 冯班：《钝吟书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第552页，1979年。

[2] 钱泳：《书学》，《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第620页，1979年。

[3]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卷三《宝南第九》，《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第805页，1979年。

[4] 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梁启超全集》第四卷《新大陆游记》，北京出版社，第926页，1999年。

梁启超在阅读、鉴别大量的碑帖拓片的同时，总是细细地品味着书体的形态，书体的嬗变是他读碑时关注的焦点。他还以古代传统书评方法为基础，进而提出了品评书法的第四种方法，即以历史著作称评书法，可谓独具特色。梁启超致力史学，对于“传统”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兼善多种书体，真、草、篆、隶无不涉及，反映出他对书法有着全面的认识。

#### （四）梁启超对学书方法的认识

学书方法自古以来就受到书家们的重视，这将对他们以后的成就产生深远的影响。但事实上，学书方法又是很难确立标准的，因为书家所处的社会背景、读书范围、所学书体以及师从对象都不一样，也就是说，学习书法是多途径的，一个成功的书家往往成为后人效仿的典范。梁启超除了对书法史及书法理论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还在学书方法方面颇有心得。他根据自己多年的学书经历，总结出很多值得后人借鉴的经验。本文通过概括、归纳将从模仿及书法创造、碑帖选择、用笔要诀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 （五）梁启超的书法活动

梁启超的书法活动主要表现在临摹、创作、对金石拓本的搜求和碑帖题跋上。梁启超一生笔耕不辍，尤其对于临帖情有独钟。在1910年于日本记录的《双涛阁日记》中，临摹碑帖几乎成了他每天的课业。梁启超主张新民思想，积极创办图书馆。为了筹集松坡图书馆的建超的题跋活动主要体现在对拓本题跋、书跋、画跋及丛帖跋等方面，题跋内容包括拓本的发现、流传及递藏，碑刻文字的校记、考释、题署碑刻及记事叙闻、书法品评等。

梁启超一生留下了大量的书迹，有数百幅碑刻题跋、书跋、画跋和难以胜计的书信，还有用各种字体创作出的不同形式的大幅作品。这些不同目的、不同环境下写出的各种书迹，多是法度严谨、端庄刚健之作，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又具有较强的审美价值。本书将以书体分类，着重对梁启超的魏体楷书、行书、隶书及篆书进行分析。

#### （六）梁启超对后世书法的价值及其贡献

梁启超作为一个政治家、学者，他的书法对后世有着不同寻常的价值及其贡献。首先，在梁启超的书法思想方面，他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对于书法的基本态度，另一方面他对于书法史的断代、对历代碑刻的品评、对南北书派论的认识等问题都提出了自身独到的见解；其次，梁启超在书法实践方面，既继承了其业师康有为以碑派书法为主流的创作风格，又善于吸纳魏晋以来的帖学传统，并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自